

冯沪祥/著

罗家伦

论人生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三位著名领导者之一，他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罗家伦论人生

冯沪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家伦论人生/冯沪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301-16126-5

I. 罗… II. 冯… III. 罗家伦(1897~1969) — 人生哲学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920 号

书 名: 罗家伦论人生

著作责任者: 冯沪祥 著

责任编辑: 尚 明 舒 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126-5/G·272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插图 21 279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丹心照古今的罗家伦先生

——代序（一）

梅可望^{* 1}

罗家伦先生是我中学时代的偶像！他的传奇最令那时代青年们津津乐道的包括：

（1）“五四运动”的健将，带头反对“北洋政府”卖国；

（2）担任过三个中学生最向往的三所大学校长，即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因为在抗战以前，这三所大学是最难考取的，能够担任这三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当然是“非常人”了！

抗战时期，他出版了震撼全国知识分子的《新人生观》，提出一系列的新观念：道德勇气、运动家风度、责任与权利，以及荣誉感等，立刻成为广大青年群的口头禅。

那时候，我是中央警官学校的助教，即在重庆，都不容易买到这本畅销书，还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已经读得很破烂的旧书，一再细读，大受激励！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想读这本书，只好先做一些重点笔记。

可惜这本笔记簿，在从大陆撤退来台时，混乱中散失了！《新人生观》研读之广，影响之大，在抗战后期，没有哪本书可以比得上的！真是一桩奇迹！

我没有机缘亲炙罗先生，但他爱国的热情，对真理的执著，文字有力而优美，尤其是他思想的先进和世界观，都使我心折！

不仅是青年时代如此，即是 60 年后，我依旧爱读他的《新人生观》，爱唱他所写的那首我最感动的《玉门出塞歌》。歌词如下：

* 本序作者梅可望博士，曾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东海大学校长，现任台湾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为教育界共同敬重的老前辈。——编按

左公柳拂玉门晓，
塞上春光好。
天山溶雪灌田畴，
大漠飞沙旋露照。
沙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岛。
过瓜田碧玉丛丛，
望马群白浪滔滔，
想乘槎张骞，
定远班超。
汉唐先烈经营早，
当年是匈奴右臂，
将来更是欧亚孔道！
经营趁早！
经营趁早！
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这首充满感情的歌曲，何等壮美！何等气势！何等爱国！唱遍了抗战胜利后的大江南北。罗先生那时应已是“知命之年”，仍然满腔热血，壮志凌云，真是令我敬仰万分！

好友冯沪祥博士也是罗家伦先生崇拜者之一，他对罗先生的生平做了很深的研究，曾在《传记文学》发表《罗家伦的办学风范》长文，很受社会重视。现应北大出版社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之邀，撰《罗家伦论人生》，嘱我作序。冯教授是哲学家，创办过东海大学哲学系与研究所，著作等身，我相信这本书一定对人生哲学有很大的启发。

我是罗先生的“粉丝”，又是冯博士的好友，盛情难却，谨传一联，以表对一代哲人的景仰！

带领五四，亲长三大学，有教无类，作育英才为国用；
纂修国史，著《新人生观》，爱国情操，一片丹心照古今。

梅可望

于台湾发展研究院

时年九十有二

“诚朴雄伟”的罗家伦校长

——代序(二)

蒋伟宁^{* 1}

中央大学前校长罗家伦先生,号志希,公元1897年生于江西南昌,原籍浙江绍兴,1969年在台湾辞世,今年正好是他辞世四十周年。

今年,同样是他发起“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纪念。

罗校长在五四运动中,亲自起草“五四宣言”,当时他临危受命,在十五分钟内完成,未改一字即交付印,全文大气磅礴,正气凛然,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尤其他在结论中强调:“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更已成为历史上的不朽名言,不但证明他的才气纵横,尤其证明他的爱国热忱,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为之动容!

罗校长在五四运动中,成功的唤醒了民众,共同捍卫山东领土主权;后来他在新疆监察使任中,又成功的折冲各方,共同捍卫新疆领土主权;在担任首任的驻印度大使中,也成功的据理力争,捍卫了西藏的领土主权!

凡此种种,均可看出,他是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一贯的立志振兴民族,而且身体力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堪称中华儿女报效民族的极佳典范!

尤其,罗校长生平最大的贡献,公认是在教育,特别是在大学教育。

他在北大毕业之后,曾到欧美名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 本序作者蒋伟宁博士,曾任“中央大学”土木系主任、研发处长、副校长,现任校长。——编按

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校留学进修六年，在1926年学成返国；8月应聘担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是他生平的第一项教职，足证与中央大学渊源很深。

次年，他以满腔热血，参加北伐军，受命为编辑委员会少将委员长，并且奉命筹组中央党务学校（后称中央政治学校，来台后改称政治大学），先任教务处副主任，后来受命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在讨伐军阀中主持校务，充分表现了沉着坚毅的精神。

1928年，原先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校长受命为第一任校长，时年才31岁，正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展现坚定的爱国精神，并以其朝气锐气大力整顿革新，勉励师生以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平为目标，并以雪洗国耻为宗旨与使命，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深厚而良好的基础。

1932年，罗校长35岁，9月6日受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勉励全校师生，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使命；他强调，个人去留期间虽有长短，但是“这种使命，应当是中央大学永久负担”，至今仍然非常发人深省！

当年10月，罗校长曾经撰文指出，“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说中国话”，主张以中文作为科学论著的语言，这样才能使科学在中国生根，至今都很有启发性。

他当时强调，讲到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特别要注意其中两种含义，那就是大家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而且必须各部分，在这个共同意识下，成为互相协调的团结力量。所以，他勉励师生，要能立志建设中大，成为“负担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责任”，至今听来，仍然铿锵有力，感人至深！

尤其，罗校长当时所提中大校训“诚、朴、雄、伟”，至今仍然深具时代意义！

他曾分别深入说明：

第一，“诚”。就是“对学问有诚意”；不以学问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也不以此为文凭资格的工具，“对于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

第二，“朴”。就是“质朴和朴实”；要能务实笃实，“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朴厚的学术气象。”

第三，“雄”。就是“大雄无畏”；代表雄厚的气魄，能够善养浩然之

气,弘扬雄健进取的精神,“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因为“不做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

第四,“伟”。便是“伟大崇高”;不应当有所谓“门户之见”,“切不可褊狭纤巧,凡事总需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

1941年,罗校长任满十年,他离职前,在日军空袭的警报声中,向全体师生演讲,再度强调,大学任务有三:

- 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
- 二是“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
- 三是“要能根据新时代的精神和需要”。

当时罗校长在结论中,特别提到他为中大写的校歌,做为“对于中大教育的一种理想”,至今仍然深深值得中大师生们领悟与力行:

国学堂堂,
多士跼跼,
励学敦行,
其副举世所展望!
诚朴雄伟见学风,
雍容肃穆在修养,
器识为先,
真理是尚!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增加人类知识总量,
进取、发扬,
担负这责任在肩膀上!

凡此种种,充分可见,罗校长办教育,终生均以中华民族为己任,形成他生平最大特色。

“中央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首任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与理学院院长戴运轨负主要责任。他就曾经感慨,当他读到罗校长遗著《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才知道中大在抗战时期迁校,是多么的艰苦,“需要多大的勇气与魄力”,进而领悟,他在台湾复校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相形之下,“简

直颇有自愧弗如之感”。

“中央大学”1968年迁至现在校址,经过全校教职员生的努力,尤其是在刘兆汉校长任期中蓬勃发展,成为一所教研并重的研究型大学,尔后的刘全生校长推动重视大一,以及接任之李罗权校长重视学术拔尖,以及推动核心通识,使中大已成为台湾最重视大学教学且研究成效卓越之重要研究型大学。

“中央大学”为了感念罗校长的贡献与风范,在1986年创立管理学院时,在这栋全校最高的教学大楼上,以罗校长的号——志希为名,取名“志希馆”,以资纪念;由此很可看出全体师生对他的景仰与怀念。

罗家伦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前后担任中大校长十年,功在中华民族,培养了无数人才,贡献既多且大。其中最为大家公认的功业,就是在日军轰炸的残破校园中,仍然雄赳赳、气昂昂的发表了十六次讲演,激励民心士气奋发图强,后来集成《新人生观》,成为全民共同抗日的最佳精神动力,不但一直高居畅销书第一名,至今仍然公认为民族精神教育的最佳典范!相信今后也必会在历史上永远发光发热,永恒不朽!

冯沪祥教授因为深深钦佩罗校长的奋斗精神与爱国风范,所以特别根据《新人生观》及其背后的民族精神,撰写《罗家伦论人生》一书,做为中大核心课程“人生与哲学”的重要教材,盼能据此提振目前青年学生的奋斗意志与人生智慧,其精神与心志,都很值得肯定。

冯教授原来修习化学,后来转攻哲学,从1986年担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就很注重人文教育,在任内创设了“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艺术研究所”,并且增设中文所博士班,均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堪称用行动传承罗校长所强调的中大使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因为很认同这项使命,并且心向往之,也很盼望中大师生同学,能够共同振兴民族文化,再创中大光荣传统,所以很乐意为此书作序,敬请各界高明多给中大指导,以便今后中大师生,能够共同“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共同完成振兴民族的使命!

是为代序。

蒋伟宁

2009年6月18日于“中央大学”

政大早期校务发展的重要推手：罗家伦先生

——代序（三）

吴思华^{* 1}

罗家伦先生与政大的渊源极为深远，影响也非常重大，堪称是本校早期校务发展的重要推手。

1927年北伐军兴，先生受任为“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与蔡元培先生等先贤同住上海丁家花园，主持文宣工作。

同年5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先生受命为筹备委员之一，商借当时停顿中的东南大学一隅为校址。1929年7月，“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即为“政治大学”前身。

当时其他八位筹备委员分别是蒋中正（校长）、胡汉民、戴传贤（教务主任）、丁惟汾（训育主任）、陈果夫（总务主任）、吴倚沧、曾养甫、刘芦隐等。罗家伦先生在筹备初期名义虽为教务副主任，但因教务主任戴传贤常在广东、校长蒋中正忙于北伐军务，实际校务多由其擘划，贡献良多。尤以开学不久蒋中正校长即通电下野，其他主任也都相继离开南京，先生受命代理校务会议主席（相当于代校长），年仅三十岁即已独当一面，堪称“英雄出少年”。

其时军阀孙传芳率众五万多人渡过长江，战事绵延到南京附近龙潭，形势紧张万分。先生兼程从上海赶回亲赴危难并慰问全校师生，强调“世界上只有杀得死的革命党人，绝没有吓得走的革命党人”，成为当时名言。政大资深教授知名史家蒋永敬即曾指出，这种气魄与其在五四宣言所说

* 本序作者吴思华博士，曾任政治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长、商学院院长、创新创造力中心主任，现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编按

名言“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完全是一贯风骨之表现。

先生于1928年受命出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整顿校务，奠定基础，但因中原大战后政局动荡，两年后便提出辞呈。1931年继余井塘先生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并兼代教育长，共三年半时间。“教育长”正是经国先生其后在抗战时承继之相同工作，且终生最喜此一头衔，足证罗家伦之德高望重辈份。

先生当时即已期许中央政校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与法国“巴黎政治学校”(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为发展目标，乃因这两所学校是振兴英法两国人才的摇篮。先生从北大毕业后曾在欧美留学七年，深知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坚持国家发展必须先有现代化的领导人才及现代化的大学。

尤其中国疆土广阔，边疆约占一半，先生便是少数注意培养边政人才的教育家。他扩充蒙藏班并于1933年设立蒙藏学校，分在包头、酒泉、西宁、康定、大理五地设立分校，以便边疆青年能够就地入学。如今证明，其思虑深具远见且器宇恢宏。

1932年9月5日，先生正式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并兼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两年后辞去中央政校工作专任中央大学校长，但仍持续关心政校校务。该年12月31日即曾特别演讲《中央政治学校之使命》，多次提出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振兴中华民族”为使命。

1959年6月，罗家伦先生在政大校庆感言中，再次力主成立大学部以期建立长期正轨教育，目标就是要把本校办成具有如法国巴黎政治学校、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学术权威性，并以“研究学术、革新政治”为雪耻图强的基础。

1961年5月，先生于《政大校友通讯》再度发表宏文《政大的诞生与成长》，申论政大成立宗旨与精神，明确地提醒大家：“真正的人才，绝不是粗制滥造的出品……，任重道远，应该是我们训练的目标”。这种慧见不但结合人心与国家需要，更形成了政大日后的重要精神传统。

罗家伦先生在中央政校时为了加强本科训练，还分别指令大一中文必读《曾国藩家书》，英文必读《富兰克林自传》；二年级中文必读胡林翼的《读史兵略》，英文必读《林肯传》；到三四年级，中文是《通鉴记史本

末》，英文在政治系是《近代民主政治》，均以名人传记之奋斗经验，作为学生效法的榜样，并以结合时代需要、促进民主素养作为政大特色，也作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至今仍深具启发意义。

他在《政大的诞生与成长》结论中特别强调：“凡是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们，对于教育事业，仍然应该保持坚强的信心。”这种“教育兴国”的信心与决心，至今仍然值得效法与力行。

政大自建校以来便致力于传承人文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除以打造国际一流人文社会学术殿堂为愿景外，更以培养具有“人文关怀、专业创新、国际视野”的新世纪领导人为重要使命。今年是罗家伦先生辞世四十周年，冯沪祥教授应北大出版社之邀撰写《罗家伦论人生》一书，以发扬光大罗先生生前提倡《新人生观》的精神。冯教授曾在本校东亚研究所博士班兼任教授多年，学识渊博，学养深厚。思华很荣幸应邀撰写推荐序文，一方面表达对罗家伦先生的追念之意；另一方面期盼以先生所提倡《新人生观》之精神为典范，持续为国家社会培育博雅创新、知行合一之未来社会领导人。

吴思华

2009年7月7日

罗家伦先生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观

——代序(四)

陈 来^{* 1}

罗家伦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名人,在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代表之一,又起草了五四当天学生运动的唯一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五四运动三周之后,罗家伦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观念的文章。五四以后,在蔡元培的帮助下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和欧洲学习。与其他留学生不同,罗家伦的特点不是以专攻学位为能事,而是留心欧美的大学教育与教育文化,所以,他归国后历任好几所大学的校长,而且成绩斐然,那是理有必然的。

罗家伦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推荐下,他于1928年秋到任清华,此时的清华已经有了新制的大学部,但是处在“改办大学”过程之中,还没有正名。罗家伦到任后正式宣布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在清华主事两年,至1930年辞去。他在清华的政绩本来相当突出,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但由于他在任内最后一段时间与当时的学生关系紧张,又由于其后任梅贻琦治校之功广被称道,他的成就便多少被淹没了,更由于他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在1949年以后,

* 本序作者陈来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鲁斯学人、客座教授,台湾“中研院”访问学人,中央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曾兼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复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现任北京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为国际知名哲学家,著作与论文均很丰富。

更少被人提起了。

最先试图公正地评价罗家伦的,是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和杨振声是罗家伦带去清华的主要帮手,所以冯友兰对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是最为了解的。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三松堂自序》里明确提到他是1928年随罗家伦到清华接收并担任秘书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其中还有颇长的文字论及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如谈到开放女禁的问题,提高教员地位的问题、与清华董事会、基金会的斗争、辞退外籍教授、实施扩建计划等。冯友兰对罗家伦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和表现都是肯定的,尤其是罗家伦当时要求撤销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要求外交部不得干预清华事务,冯友兰把它概括为“清华反对半殖民地教育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就突出了罗家伦办学的民族精神。

罗家伦是民族意识极强的人。他在五四当天所写的宣言结尾大声疾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他的一腔爱国热血在此表露无遗。罗家伦到清华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把“学术独立,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完成建设新中国”作为清华大学的使命,同样突出体现了他的民族意识。后来他在主掌中央大学等校时反复强调“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大使命”,“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都充分表现出他的一贯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意识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呼吁振兴中华民族,始终以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鼓励并教育学生,这种精神对今天海峡两岸的青年来说,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罗家伦不仅一贯不遗余力地呼吁爱国救国,他的民族意识也体现在对于民族文化的表扬。他曾写有《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一文,把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的特点概括为六条:

一、尚人伦。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

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为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

五、主容忍。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起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周武宗、唐武帝,三武灭佛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

六、爱大同。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象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罗家伦上述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并不是得自他人,而是出于自己的感受和总结,其中集大成、主容忍、爱大同几条,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体认。他在此文的最后表示:“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里还指出: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所以今日中国的急务,是要有一种整个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罗家伦的这种民族文化观是很有见地的,放在今天,更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

冯沪祥教授是台湾哲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是台湾政坛的知名人士,他

秉承民族主义的人生观,一贯鲜明地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志业,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反对各种“去中国化”的举措,这在今天的台湾,是极为难得的。冯教授始终如一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而有的顽强的生命动力,在政治上愈挫愈勇的斗争精神,我的确非常钦佩。据他说,他的人生观曾受到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很大影响,现在他作成《罗家伦论人生》一书,意在以积极刚健的人生观,以奋发进取的中华意识,以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促进两岸青年携手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盛世,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承他的热情,在我今年刚刚转任清华不久,邀我为这本介绍罗家伦人生观的书写几句话,这在我个人也觉得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冯友兰先生是我的老师,而冯先生正是随罗家伦而进入清华领导层,后又担任清华文学院长十八年,如今我既已在清华工作,理当为追随和表彰清华前贤效微薄之力,故略述感想如上,以为之序。

陈 来

2009年8月1日于清华大学立斋